# 中共終將死於「公私合營」

文/陳靜

6月19日，中共官媒新華社高調刊發長文，大肆頌揚1950年代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績「公私合營」。

新華社在文章中選擇了用詩意的表述：「從私營到公私合營，再到全民所有，河畔的工業遺產不再是生產岸線，而是化身工業綠地和藝術空間……」

其用詩意的語言，行最惡毒的意志。回溯60年的時光，1956年天安門廣場鑼鼓喧天地上演為「公私合營」造勢，然後是五萬企業主被汙衊為「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落得家破人亡的結局。

而今天的新華社把當年血腥的「公私合營」說成了綠地和咖啡館般曼妙的美好時光，那美好背後是中國企業家們在政治高壓下苟延殘喘的恐懼。

隨後兩天，《人民日報》又接連發表〈社會主義改造記〉與〈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記〉，高調鼓吹社會主義工業化成就，繼續為死去的「公私合營」招魂。

這些文稿將歷史上的血淚教訓全部抹去，只留下所謂的「偉大變革」、「和平贖買」與「寶貴經驗」。

網絡圖片




▲1955年，上海信大祥綢布店換上了公私合營的招牌。

## 五萬商戶　榮毅仁們的悲劇

在新華社的敘事中，當年被稱為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的榮氏家族企業——福新麵粉廠與申新紡織，曾被當作「公私合營」的典範。然而，今日官方文章對榮毅仁的名字隻字不提，更不敢披露榮家產權的真正終局。

那是1952年，「五反運動」爆發，中共通過工作隊進駐、發動工人揭發、政治打壓，將全國近百萬私營工商戶劃分為五類。榮家因有被利用的價值，從「基本守法戶」又政治定性為「完全守法戶」。

1954年，榮毅仁被迫帶頭將家族產業全部交出；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視察上海申新九廠，10天後榮毅仁代表上海工商界提交全市「公私合營」申請書，獲封「紅色資本家」。

然而，這頂光鮮的帽子還沒戴多久，很快就被丟到了地上。1966年文革爆發，榮毅仁被抄家、剃陰陽頭、派去運煤和刷廁所，手指折斷一根，從國家級標桿淪為批鬥對象。這個紅色樣板在悲苦中走過13年漫長的歲月。等到了1979年鄧小平時代，中共又需要這個樣板的時候，榮毅仁再次被拉出來帶頭，於是他開始組建中信。

## 馬雲被約談到1%黃金股

中共為甚麼會在2026年高調重提1956年？因為過去10餘年間，習近平當局正在全面重演對民營經濟的控制與閹割。

梳理這段歷史，脈絡清晰可見：2018年民間驚呼「民營經濟離場論」與「新公私合營」；2020年11月，螞蟻集團在上市前36小時被四部門聯合約談，並強行叫停上市，馬雲淡出公眾視野。

這不是單純的金融監管，而是宣示無論民企規模多大，絕不允許擁有獨立的商業決策權與話語權。

緊隨其後的，是名為「黃金股」的強權控制機制。國資或網信辦背景的基金僅需購入1%的微小股權，便能派駐董事、握有一票否決權，掌控微博、字節跳動、阿里、騰訊、快手等網絡平臺的內容許可與方向。

不同的是，1956年的公私合營，是國家拿走大股權派駐公方代表；而今天的「新公私合營」，是用1%的「黃金股」加黨委進駐，以極低代價抽乾了民企的獨立靈魂。

## 2026「新公私合營」

1956年的消滅民營，是連人帶產權一起消滅，結果導致中國經濟陷入幾近崩潰的死胡同，不得不於1978年重新開放民營經濟。

習時代的消滅民營採取了更具欺騙性的手段：留下任正非、雷軍、王傳福等企業家的「肉身」與企業名號，讓企業繼續運轉、承擔風險、創造就業與繳納稅收，但徹底剝奪其作為獨立經濟主體的決策權。

企業的核心決策權，做甚麼、不做甚麼、對誰負責，已被黨委、黃金股與監管審查抽走。

中共不再需要掏出真金白銀去贖買股權，只需要將企業家降級為體制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高級打工人即可。

## 中共始終於「公私合營」

1950年代，中共政權靠「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建造起計畫經濟的極權鐵籠，最終走投無路；如今在地方財政衰竭、外資撤退、青年失業率高企的絕境下，再次掏出「公私合營」這把舊刀，預想通過掠奪民企財富與控制經濟命脈來苟延殘喘。

失去獨立性與產權安全感的地方經濟，必然喪失創新動力與投資信心。當資本徹底窒息、企業全面躺平、失業海嘯鋪天蓋地而來之時，這套靠壓榨民企維繫的極權機器將再無油料可燃。

「公私合營」死灰復燃，並不是中共黔驢技窮的無奈，而是其骨子裡的邪惡循環。1966年7月，毛澤東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

其所謂的「大亂大治」不過是中共與天鬥、與地鬥那一套整人把戲的重演，看清了這一點，榮毅仁們就不會再糊塗了，只要中國人清醒了，中共的戲就唱不下去了。

# 盛雪　菲爾茲獎與尋釁滋事 兩組中國學子的命運

文/盛雪

2026年7月的時空背景下，一邊是學術殿堂的最高榮光，另一邊是密不透風的看守所高牆，兩組中國籍年輕學子的命運構成對中共暴政最嚴酷的諷喻。

剛剛落幕的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中國籍年輕數學家王虹與鄧煜憑藉在數學領域的卓越貢獻榮獲菲爾茲獎，被譽為人類智力峰巔的探索者。

同一時刻，維權網的通報卻將另一幕殘酷現實撕開：萊頓大學哲學碩士胡洋與米蘭理工大學計算機碩士吳昊宇，這兩位同樣出類拔萃的年輕學子，僅因在海外表達了獨立思考、關注了人權公義，便在暑期回國探親入境時被當場攔截，被投入「尋釁滋事」的黑箱經受折磨，等待「審判」。

同樣是懷揣天資、遠赴海外求學的年輕菁英，同樣代表著理智與探索精神的延伸，卻因中共一條禁錮靈魂自由的枷鎖，而走上了雲泥之別的人生之路。

## 兩組年輕人的自由與高牆

王虹與鄧煜的成功，本質上是人類智力菁英在極權環境之外的生存突圍。這兩組年輕人的命運對照，首先揭示了學術與思想賴以生存的生態差異。

他們將寶貴的學術黃金期置於開放、自由的學術體系之中，讓自己的智商得以提升和釋放。

自由的世界客觀上成為科學研究的避風港。正是因為遠離了政治審查與權力干預，其智力潛能才得以毫無顧忌地向上伸展，最終在世界舞臺上摘得桂冠。

胡洋擁有武漢大學化學與法學的雙學士學位，繼而攻讀萊頓哲學碩士；吳昊宇則是米蘭理工的計算機高材生。

他們同樣有著極高的科研天賦，具備超人的聰明才智與開闊的視野。更可貴的是，他們並懷揣著對社會真相與公義的樸素關切。

然而，當他們帶著自由世界的見聞與思考踏上故土，迎接他們的不是尊重與鼓勵，而是機場的攔截、長達百餘天無法會見律師的秘密扣押，以及荒謬的政治罪名「尋釁滋事」。

中共允許你計算天體運行的軌跡，卻絕不允許你拷問權力的荒謬。

## 極權的算力與文明的靈魂

中共暴政渴望科技與算力為其壯大國力、鞏固統治服務，卻極度恐懼具有現代文明的自由心靈與精神。

在中共暴政的邏輯中，菁英最好的歸宿是成為「精密的螺絲釘」，只負責攻克技術難題、編寫代碼或推演公式，為自己壓迫人民而用，但必須完全放棄人應有的尊嚴、道德判斷、社會關切與政治思考。

然而，科學與理性的訓練具有天然的延伸性。嚴密的邏輯、實證的精神與懷疑的意識，一旦在年輕的頭腦中扎根，他就很難對現實中的謊言、荒謬與不公視而不見。胡洋與吳昊宇在專制者眼裡，構成了對權威最危險的挑戰。

## 中共收割成果與毀滅靈性

每當海外培養出的華人學者獲得國際大獎，官方輿論與民間無腦狂熱便會迅速蜂擁而至，將其包裝為中華民族復興的證明和國家的榮光，強行將自由土壤開出的智能花朵歸功於自身的血脈與體制。

對同樣優秀的青年學子因言獲罪、身陷囹圄的慘痛現實進行封鎖、抹殺，甚至對其發聲求助的家屬威脅噤聲。

人類的智慧只有在自由的空氣中才能登頂峰巔，就像王虹與鄧煜；而胡洋與吳昊宇在鐵窗下的失聲更讓人痛徹心扉，當獨立思考成一種高風險的原罪，暴政的毀滅就是一種必然的彰顯。

暴政與民族自由，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